

# “独语”与“公仇”

## ——论鲁迅的精神气质与中国现代传媒的生命力

陈彩林

**摘要：**鲁迅的创作既渗透着“独语”的精神气质，也同时贯注着“公仇”的精神气质，二者与中国现代传媒有着分不开的血缘关系。当他“独语”的时候，我们往往能于其中体验到愤怒乃至痛苦到极致的“公仇”情绪；而当他置身满是敌意的“公仇”的时候，又往往激发出他灵魂深处的“独语”。向内的“独语”实质是一种以极具拒绝性、封闭性的方式打开通向整个世界通道的极致的生命艺术，最终反而转化成了被广泛接受的“众语”；向外的“公仇”实质是借助现代传媒的公共舆论导向功能向国人展开以正视听的真理辩护与传播。二者既凸显出鲁迅最具特质的精神性存在、思想最深刻的部位与最个性化的表达方式，也同时为中国现代传媒构筑了最具思想穿透力与持久艺术魅力的传播生命力。

**关键词：**鲁迅；精神性存在；中国现代传媒；生命力

**作者简介：**陈彩林，男，文学博士，博士后（在站）。（玉林师范学院 文学与传媒学院，广西 玉林，537000）

**中图分类号：**I2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552 (2016) 01-0031-07

回到鲁迅文学创作起始最具历史标志性的作品——《狂人日记》，我们会发现一种独特的言说方式。在总体格局上，《狂人日记》是以“我”之独语的方式展开言说的。这种言说以真切的心理感受呈现出“狂人”这一个体之于社会群体之间的紧张关系：

今天全没月光，我知道不妙。早上小心出门，赵贵翁的眼色便怪：似乎怕我，似乎想害我。还有七八个人，交头接耳的议论我，又怕我看见。一路上的人，都是如此。其中最凶的一个人，张着嘴，对我笑了一笑；我便从头直冷到脚跟，晓得他们布置，都已妥当了。<sup>[1]</sup>

“我”（狂人）确然是这个社会的“公仇”。“我”的“独语”凸显出“狂人”异于群体超乎寻常的清醒与理性。唯此，“我”在都写着“仁义道德”的历史字缝里发现了“吃人”，发现了这个群体“狮子似的凶心，兔子的怯弱，狐狸的狡猾”，“难见真的人”。这个“我”（狂人）正是以“真的人”（区别于群体的历史新人）的身份展开“独语”言说的，而正是这种言说将“我”置于“公仇”的位置。因此，“狂人日记”实则是“新人独语”，是新人“实为公仇”的自言自语，更确切地说，是“我”以“独语”与“公仇”的“狂人”身份抗拒“四千年吃人履历”的传统历史惯性朝向现代性“真的人”的言说。但是，这种原本是封闭的、排他的、内省的自言自语反而成为鲁迅创作最动人的艺术景观，具有持久的艺术魅力与传播生命力，而“公仇”也同时彰显出其思想的深刻性与变革力量。整体审视，鲁迅的整个文学创作既渗透着这种“独语”的精神气质，也同时显示出“公仇”的紧张情势，他的一生其实是“独语”的一生，也是“公仇”的一生。向内的“独语”与向外的“公仇”，最终融合为鲁迅最具特质的精神性存在，不仅凸显出他独特的精神气质与创作情状，也凸显出他何以为中国现代传媒注入了最具生命力的内质。

“新人独语”就是借助《新青年》(1918年5月第四卷第五号)推出的。《新青年》无疑是中国现代传媒最具历史感召力的桥头堡。五四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现代传媒孕育而成的。以《新青年》为代表的中国现代传媒以实实在在的历史驱动力影响着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而中国现代传媒的这种历史驱动力或者说是生命力的历史根源,其最本质、最核心的部位恰恰是诸如《狂人日记》这样的“新人独语”。这里,就出现了一个多层次的且极具悖论的文化景象:第一,以《狂人日记》为代表的新文学创作是与现代传媒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二者有着分不开的血缘关系;第二,以《新青年》为标志的中国现代传媒最具生命力的部位恰是源自诸如《狂人日记》这样的新文学创作;第三,诸如《狂人日记》这样的新文学创作凸显出一种“独语”的言说方式与精神气质,而“独语”则具有封闭性、排他性与内省性;第四,以《新青年》为标志的中国现代传媒肩负着以现代性为内质的思想启蒙使命,而思想启蒙是需要双方展开对话与思想交流的,或者说,现代传媒本身是面向受众而开启言说的。正是这种充满悖论的历史情形凸显出20世纪中国现代传媒发展中的鲁迅因素,凸显出中国现代传媒最具持久生命力的部位。

所谓“独语”实质是孤独的个体径直逼视自己灵魂的“极深的内省”。事实上,现代传媒正是诱发鲁迅这种独语的重要因素,《呐喊·自序》真实再现了这种情形。1907年夏,27岁的鲁迅“寻到几个同志”筹办《新生》文艺杂志,取名“新生”意在借助现代传媒进行思想启蒙再造民族“新的生命”。这份寄托着鲁迅改造国民性理想的杂志“出版之期接近了,但最先就隐去了若干担当文字的人,接着又逃走了资本,结果只剩下不名一钱的三个人”,“而其后却连这三个人也都为各自的运命所驱策,不能在一处纵谈将来的好梦了”。<sup>[1](439)</sup>这种结局让鲁迅进入了一个“独语”的世界:

我感到未尝经验的无聊,是自此以后的事。我当初是不知其所以然的;后来想,凡有一人的主张,得了赞和,是促其前进的,得了反对,是促其奋斗的,独有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的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呵,我于是以我所感到者为寂寞。<sup>[1](439)</sup>

由此,鲁迅进入了“一天一天的长大起来,如大毒蛇,缠住了我的灵魂了”的十年寂寞,这正是“独语”的前提。而打破这十年寂寞生存情状的又恰与现代传媒紧紧联系在一起,这便是《新青年》的约稿。十年前流产的《新生》不正在《新青年》那里获得了重生吗?答应《新青年》为它写文章本来是“喊几声助助威”<sup>[2]</sup>的,但是张口说出的却是“狂人”的自言自语。或者说,以《狂人日记》为代表的创作不正是鲁迅十年寂寞蓄积的“独语”的集中释放吗?正因为独语是“极深的内省”,所以对于中国的社会历史与民族生存才会透视得如此深刻:“四千年”的中国社会历史在“仁义道德”的面具下“吃人”,“有着四千年吃人履历”的民族“难见真的人”。这不正是鲁迅置身于荒原般的社会不能交流、只能“独语”的最大苦闷吗?《新青年》于民族社会历史转折处最具石破天惊的公共舆论效应恰恰是这种最极致的个人化“独语”释放的,彰显出现代传媒最具历史转折意义的思想变革力量。

历史总是螺旋式地轮回与演进,短暂的“五四”高潮之后,特别是1923年军阀血腥镇压工人运动的“二七”惨案之后,“整个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也暂时转入了一个沉寂的时期”<sup>[3]</sup>。“这种沉寂和荒凉,反映在思想文化方面,就是蓬勃发展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出现了逆转和挫折”<sup>[3](6)</sup>。寄予的希望越大,现实挫败引发的失望、痛苦与反思也就越发强烈。正如《新生》的夭折使鲁迅进入如大毒蛇绕住灵魂的寂寞一样,《新青年》团体的分化使怀着“毁坏铁屋子”的希望、“呐喊”战叫的鲁迅又再次进入寂寞的荒原:

后来《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我又经验了一回同一战阵中的伙伴还是会这么变化,并且落得一个“作家”的头衔,依然在沙漠中走来走去……<sup>[2](469)</sup>

这种“依然在沙漠中走来走去”的寂寞最终催生的却是另一份现代期刊的创办与又一次更为集中、更具排他性与内省性的“独语”的最集中释放,这便是《语丝》周刊的创办与《野草》各篇的创作。从1924年12月1日《语丝》周刊第3期到1926年4月19日《语丝》周刊第75期,鲁迅陆续于其上

推出了从《秋夜》到《一觉》共23篇散文诗，最后结集为《野草》，并于1927年7月2日《语丝》周刊第138期推出《野草》的结集《题辞》。也就是说，《野草》是与《语丝》周刊紧紧联系在一起的。“独语”的精神气质虽然渗透于鲁迅的整个文学创作，但是像《野草》这样“独语”到极致的作品在他的创作中乃至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创作中都是极为独特的。这组在《语丝》周刊上推出的24篇散文诗在鲁迅的创作中无疑是最具封闭性、排他性、内省性的作品，但正是这部作品“包含着鲁迅的全部人生哲学”，构成鲁迅思想最丰厚的部位。

鲁迅在现代传媒上“独语”的这种情形，他自己最先表明是在1919年8月19日至9月9日在《国民公报》副刊上陆续发表总题为《自言自语》的7篇散文诗。“自言自语”就是“独语”，如果深入到鲁迅文学创作最本质的部位，你会发现他的创作实质是孤独的个体于心的炼狱之中“独语”。这是鲁迅一生一以贯之的独特情形。就在他去世前4天即1936年10月15日还于《作家》月刊第2卷第1期发表了一组总题为《半夏小集》的“独语”。

整体来看，鲁迅文学创作的过程也同时是他倾力参与中国现代传媒发展的过程。从筹办《新生》到去世，他一生主编、参编的刊物多达20多种，诚如李长之所说：“当代文人中，恐怕再没有鲁迅那样留心各种报纸了吧。”<sup>[4]</sup>从事后来看，鲁迅热衷于现代传媒的初心早在筹办《新生》时就已表露无遗，即借助现代传媒的公共性和干预、批判、导向的功能进行思想启蒙，改造国民性以重构民族“新的生命”，而且这颗初心自始至终都未曾改变。事实上，他的文学创作与现代传媒紧紧结缘在一起，他的作品大都是在现代报纸杂志上先发表而后结集的。既然现代传媒的力量是为了构建公共舆论空间，或者说，是为了争取甚至是争夺话语权，那么它发出的自然应该是“众语”，而非封闭的、排他的、内省的“独语”。值得注意的是，鲁迅与现代传媒联姻的文学创作最特异的地方恰恰是渗透着“独语”的精神气质，《语丝》周刊推出的后结集为《野草》的24篇散文诗将这种情形最集中地表露出来。从1918年5月在《新青年》第4卷第5号上发表《狂人日记》，到1919年8月19日至9月9日在《国民公报》副刊上陆续发表《自言自语》，再到《语丝》周刊历时两年多推出《野草》各篇，最后到去世前4天即1936年10月15日于《作家》月刊第2卷第1期发表《半夏小集》，鲁迅的一生也可谓在现代传媒上“独语”的一生。毫无疑问，中国现代传媒与鲁迅文学创作如果去除这种“独语”部分，二者内质的丰富性都将大为损伤，二者的生命力都将大为削弱。

## 二

既然“独语”是封闭的、排他的、内省的，而现代传媒旨在构建的是公共话语空间，那么鲁迅这种极致的个人化的“独语”何以能转化为现代传媒的“众语”呢？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需要回到鲁迅对于文学创作的认识与实践上。早在《摩罗诗力说》中鲁迅就较为成熟地表述了文学的“特殊之用”：

盖世界大文，无不能启人生之闷机，而直语其事实法则，为科学所不能言者。所谓闷机，即人生之诚理是已。此为诚理，微妙幽玄，不能假口于学子。如热带人未见冰前，为之语冰，虽喻以物理生理二学，而不知水之能凝，冰之为冷如故；惟直示以冰，使之触之，则虽不言质力二性，而冰之为物，昭然在前，将直解无所疑沮。惟文章亦然，虽缕判条分，理密不如学术，而人生诚理，直笼其辞句中，使闻其声者，灵府朗然，与人生即会。<sup>[1](74)</sup>

在鲁迅那里，文学作为人生的艺术、生命的艺术其“特殊之用”最突出地表现为“启人生之闷机”，而这种“启”不仅在于其内容本身即是“人生之诚理”，而且还在于它区别于“学术”的独特艺术形式使它在“启人生之闷机”上具有“人生诚理，直笼其辞句中，使闻其声者，灵府朗然，与人生即会”的独特开启之效。也就是说，文学源于生活，而生活对于作家不是浮泛的，并不是什么样的生活都可进入文学，它必须深入到作家灵魂深处与意识边际，故而所获得的“人生之诚理”“微妙幽玄”，

以致于“不能假口于学子”。这对于文学艺术的生命力所在尤为切要，否则，就会流于失去鲜活生命感的干瘪与枯燥，更不能“使闻其声者，灵府朗然，与人生即会”，而这正是文学的致命伤。换句话说，只有深入到灵魂深处与意识边际的生命体验才能根柢性地切入人之存在的宇宙本源、世界本质与生命本真（“人生之诚理”），才能作出人之为人的独特应对（“启人生之闷机”）。而文学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将这种人之为人的应对直笼其中，最本质地还原了这种精神性的氛围，使之弥漫周遭，与人生即会，故而能于微妙幽玄之中“启人生之闷机”。

整体审视鲁迅的文学创作，其独语部分恰恰是最能凸显上述文学的“特殊之用”。他的“独语”往往与他最痛切的生命体验联系在一起，《野草》便是最好的确证。《野草》时期，他的小说集命名为“彷徨”，他的杂文集命名为“华盖”，这无不表明此期是他人生最为艰难、痛苦的时期。一方面，就民族而言，此期“《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意味着五四的退潮，此时的鲁迅置身于传统与现代之间“荷戟独彷徨”；另一方面，就个人而言，此期的他确乎是命运多舛，女师大风潮与校长杨荫榆的对抗、与陈西滢的文战，被教育总长章士钊非法免除教育部佥事职之后对于章士钊的诉讼，加之1923年使他大病一场的与周作人的兄弟决裂（两年来一直避免与周作人碰面），真可谓“运交华盖”。这样的境遇催生出鲁迅“野草”式生存的“独语”。唯其如此，这种“独语”浸透着深切的生存体验，蕴注着精神的焦灼、灵魂的不安以及内心的孤独、虚无、绝望等种种复杂的情感，深入到生命与时代的底层，以致于“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进一步审视，这些不能“开口”的“独语”又绝不是个人园地的自怨自艾，而是“所有的思考都指向对整个民族乃至人类生存的终极关怀”<sup>[5]</sup>。事实上，这些“独语”在“极深的内省”中最终升华为具有普世意义的精神哲学。所谓“极深的内省”实质是穿越常人难以达到、也难以承受的孤独甚至是绝望的生命体验，而将生命与时代最底层的部位呈示出来，在极度封闭、排他的表象之下打开的却是通向整个世界的通道，最终实现了深刻的本质统一。也就是说，“独语”所开启的正是最为“微妙幽玄”的“人生之闷机”、“人生之诚理”，所契合的正是文学之于个体的“特殊之用”。“独语”实质是一种不仅“不能假口于学子”，而且只能诉诸于“无声的言语”的极致的艺术形式，因为唯有在排他之中才能径直逼视自己的灵魂深处，进行“极深的内省”，才能升华出具有宇宙本源、世界本质与生命本真意义的“人生之诚理”。这样，本是极度拒绝的“独语”反而获得了最开放的影响，在中国现当代文学近百年的文学史里就单部作品而言唯有“《野草》学”形成近似《红楼梦》研究那种“红学”的学术格局便是最好的明证。事实上，天才的艺术家都会以极致的文学形式来表达这种不能交流、只能“独语”的苦闷象征。然而，“正是这种极致的个人化的‘独语’，反而冲破了‘自然个体’的局限，升华为具有普遍意义的‘艺术个体’，因此，这时的‘独语’反而成了‘众语’，有了可以被广泛接受的艺术魅力”。<sup>[6]</sup>反之，“众语”最深刻、最具普遍意义的思想部位恰恰是“独语”。

### 三

要特别指出的是，近现代以来是中国最需要具有历史现代转折意义的思想家的时代，但是这种思想家的职能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文学家担承的。中国文学在中国社会历史的现代化大变动中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中国缺乏西方14—17世纪文艺复兴那样的历史时期较长的以自身为目的的相对独立于社会政治运动之外的发展充分的以理性主义与人本主义为核心的人文运动。<sup>[7]</sup>理性主义、人本主义文化运动在中国缺乏相应的社会物质力量，缺乏相应的客观的深厚的社会基础，文学在很大程度上、在极为艰难的时势中担负着这一历史功能。“文学革命”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最有实绩的部分证明了这一点。而“五四”新文化运动也可以说是以《新青年》为代表的中国现代传媒孕育的，也同时彰显了现代传媒在思想传播上的巨大能量。显然，担承着“立人”与“立国”使命的中国现代文学家们都

有着自觉借重这种现代传媒力量的清醒。鲁迅便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他既是中国新文学的先驱，同时也是中国现代传媒的先驱。特定的历史时势使中国现代文学与中国现代传媒紧紧结合在一起，或者说，近现代以来的文学变革几乎都是由现代传媒导引的，诚如曹聚仁所言：“中国的文坛与报坛是表姊妹，血缘是很密切的。”<sup>[8]</sup>事实上，二者的目的是一致的，即通过现代性思想启蒙实现中国社会历史的现代转型。

中国现代传媒的历程表明了这样一个规律：思想是传播生命力之魂。梁启超在《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中强调“去塞求通，厥道非一，而报馆导其端也”。严复在《〈国闻报〉缘起》中也强调报刊“通上下之情”的功能。总之，梁启超、严复等中国现代传媒先驱创办报刊的目的就是传播民主、科学思想以启蒙民智。最有思想的报刊同时也是最有传播生命力的报刊，《新青年》便是最杰出的代表。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后创办报刊更注重思想的传播功能。事实表明，“有思想的传播才是有生命承传价值的传播，才是有持久影响力的传播，才是高层次的传播。”<sup>[9]</sup>

中国现代文化思想史上文学家承担着思想家的职能，文坛与报坛表姊妹的血缘关系，这种情状正表明了文学是现代传媒最具生命力的部位。因此，在前文已论鲁迅极致的个人化的“独语”何以能转化为现代传媒的“众语”，而“众语”最深刻、最具普遍意义的思想部位又何以是“独语”的基础上，我们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鲁迅具有“独语”精神气质的文学创作实则为中国现代传媒构筑了传播生命力之魂。或者说，由诸如《狂人日记》、《野草》之类的鲁迅“独语”转化而成的、具有被广泛接受的艺术魅力的“众语”，因为是基于中国社会历史转折处基于自我深切的生存体验与深邃的思想穿透发出的，洞察到生命与时代的底层，最终冲破了“自然个体”的局限升华为具有普遍意义的“艺术个体”，所以才会成为中国现代传媒最具生命力的传播，成为中国现代传媒最具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生命力之源。

#### 四

当鲁迅的“独语”转化成“众语”的时候，中国现代传媒于此获得的是一种极具内向性的传播力，一种显示灵魂的深邃的传播力。正如《狂人日记》是向着四千年中国历史与民族生存深处发出的，又是向着未来民族“真的人”发出的，所以“颇激动了一部分青年读者的心”。但是，在历史转折处，面对强大的四千年传统历史惯性，这种“独语”转化为“众语”的过程激起的却是“公仇”。这种情形《狂人日记》实则是最形象的展示，发出“吃人”、“难见真的人”、“救救孩子”之类“独语”的“狂人”必然成为那个社会的“公仇”。“狂人”的遭遇实则是鲁迅的宿命，所以他一生“独语”，也一生“公仇”。于此，又展示出鲁迅创作另一种独特的情形，一种迥异于“独语”的双向（多向）论战，一种“毫无乞灵于牛皮和废铁的甲冑”的赤膊之战，由此构成中国现代传媒最犀利的部位，这种投枪匕首式的传播也同样是中国现代传媒的生命力所在。

从“五四”时代起，鲁迅就通过现代传媒展开了“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对复古派、章士钊、学衡派、现代评论派、古史辨派、梁实秋、胡适、“自由人”、“第三种人”、“民族主义文学”乃至左翼文学的许多人物，鲁迅都与之论战过，或是批评过。正如鲁迅的“独语”不是个人园地的自怨自艾一样，他的直接如投枪匕首的论战也绝不是出于个人的恩怨。对此，他曾做过真诚的表述：

但读者不察，往往以为这些是个人的事情，不加注意，或则反谓我“太凶”。我的杂感集中，《华盖集》及《续编》中文，虽大抵和个人斗争，但实为公仇，决非私怨，而销数独少，足见读者的判断，亦幼稚者居多也。

平生所作事，决不能如来示之誉，但自问数十年来，于自己保存之外，也时时想到中国，想到将来，愿为大家出一点微力，却可以自白的。<sup>[10]</sup>

“实为公仇，决非私怨”，表明鲁迅的论战在表象上“虽大抵和个人斗争”，但实质上却是“时时想

到中国,想到将来,愿为大家出一点微力”。正如汪晖所言,鲁迅所谈论的具体的人与事往往是社会众生相的一个缩影,是他“国民性批判”的一个部分。鲁迅的创作在渗透着“独语”精神气质的同时,也向国人甩出了一记令其惊醒的鞭子。当他沉默“独语”的时候,那是“极深的内省”;当他对垒论战的时候,那是“精神界之战士”借助现代传媒的出击。《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以一种与论敌针锋相对的方式为文集命名,充溢着“精神界之战士”在“四面都是敌意”的“围剿”中与敌阵短兵相接的火药味。这种只为“公仇”的论战实质是借助现代传媒的公共舆论导向功能向国人展开以正视听的真理辩护与传播。

1930年3月发表于《萌芽月刊》的《“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便是其中著名的一例。在梁实秋那里,资产是文明的基础,所以反对资产阶级便是反对文明,所以无产者在这样的文明面前只配当奴才;所谓的“阶级”,只是“几个过于同情心而又态度偏激的领袖”们人为地制造出来的,革命实则是“本来没有阶级的自觉”的无产者受这种观念的唆使;因此,文学的根本不应该表现人的阶级性,而应该表现最基本、最普遍的人性。而且,梁实秋在《文学有阶级性吗?》这篇文章中还进一步举例论证,“人生现象有许多方面都是超阶级的。例如,恋爱(我说是恋爱的本身,不是恋爱的方式)的表现,可有阶级的分别吗?例如,歌咏山水花草的美丽,可有阶级的分别吗?没有”,所以,“人们的人性并没有两样,他们都感到生老病死的无常,他们都有爱的要求,他们都有怜悯与恐怖的情绪,他们都有伦常的观念,他们都乞求身心的愉快。文学就是表现这些最基本的人性的艺术”。这种人性论实质是美化资本家,贬污无产者,在“无阶级性”、“超阶级性”的表象之下其实充当的恰恰是资产阶级的代言人,因此,鲁迅敏锐地意识到“作者虽然单独执笔,气类则决不只一人”。针对梁实秋的这种资产阶级人性论,鲁迅进行针锋相对、简明有力的论辩:

梁先生首先以为无产者文学理论的错误,是“在把阶级的束缚加在文学上面”,因为一个资本家和一个劳动者,有不同的地方,但还有相同的地方,“他们的人性(这两字原本有套圈)并没有两样”,例如都有喜怒哀乐,都有恋爱(但所“说的是恋爱的本身,不是恋爱的方式”),“文学就是表现这最基本的人性的艺术”。这些话是矛盾而空虚的。既然文明以资产为基础,穷人以竭力爬上去为“有出息”,那么,爬上是人生的要谛,富翁乃人类的至尊,文学也只要表现资产阶级就够了,又何必如此“过于富同情心”,一并包括“劣败”的无产者?……文学不借人,也无以表示“性”,一用人,而且还在阶级社会里,即断不能免掉所属的阶级性,无需加以“束缚”,实乃出于必然。自然,“喜怒哀乐,人之情也”,然而穷人决无开交易所折本的懊恼,煤油大王那会知道北京检煤渣老婆子身受的酸辛,饥区的灾民,大约总不去种兰花,像阔人的老太爷一样,贾府上的焦大,也不爱林妹妹的。……倘以表现最普遍的人性的文学为至高,则表现最普遍的动物性——营养,呼吸,运动,生殖——的文学,或者除去“运动”,表现生物性的文学,必当更在其上。<sup>[2](207)</sup>

他的论辩辛辣、犀利,一针见血,直击要害,使真理愈辩愈明,也同时为中国现代传媒获取了正本清源的公信力。鲁迅也因此招人误解与攻讦,甚至落下了“刻薄”、“爱骂”、“好斗”的恶谥。但是,他终其一生也不曾改变这种“公仇”之战。这种“公仇”实则是以一种最为开放、最为直接、最为外向的方式将“人生之诚理”直达给国人。这也同是以《新青年》为代表的中国现代传媒最具影响力、生命力的重要传播方式。

## 五

“独语”是向内的无声言说,是个人内心与外在世界的独特记录,折射出鲁迅孤独、痛苦、虚无乃至绝望的精神世界,这种“极深的内省”既是灵魂的逼视,也是“绝望地抗战”。在这种“极深的内省”中,鲁迅忘了向读者说教,排除了他人的干扰,在灵魂的最深处捕捉难以言传的生命体验与心理

意识,进行深邃的人生哲学思考,这实质是一种以极具拒绝性、封闭性的方式打开通向整个世界通道的极致的生命艺术。这种极致的个人化的“独语”因其超越了个人的自怨自艾,升华为民族生存乃至整个人类终极关怀的“极深的内省”,所以中国现代传媒反而因为诸如鲁迅《狂人日记》、《野草》这样的“独语”开拓出了具有历史穿透力的“众语”空间,最终以持久的艺术魅力获得了世界性的影响。

“公仇”是向外的有声论战,是直接明了的分析、评鉴、交锋,是以最快捷的方式打破“瞒和骗的大泽”。在这种外向的文化论战之中,鲁迅不仅直面论战对象,而且还直面民众,其目的就是辨明是非,去除真理的遮蔽,让蒙蔽民众的“麒麟皮下的马脚”无处遁形。这种毫无遮饰的论战因其“实为公仇,决非私怨”,是为了澄清杂糅于芜秽之中的真理,所以中国现代传媒也同样因为这种文化战开拓出了具有历史穿透力的“众语”空间,辐射出了持久的启蒙民众的精神力。

整体审视,这种本是个人化的但又超越个人自怨自艾、向内深省的“独语”与本是人我论战但又超越私人恩怨是非、向外释放的“公仇”,构成了鲁迅最特异的生命与创作景观。鲁迅的创作不仅渗透着“独语”的精神气质,而且也同时贯注着“公仇”的精神气质。二者往往交融在一起,形成了一个矛盾的统一体。所以,当鲁迅“独语”的时候,我们往往能于其中体验到愤怒乃至痛苦到极致的“公仇”情绪;而当他置身满是敌意的“公仇”的时候,又往往激发出他最内在化的、灵魂深处的“独语”。这种情形凸显出鲁迅最具特质的精神性存在,凸显出鲁迅思想最深刻的部位与最个性化的表达方式,也同时为中国现代传媒构筑了最具思想穿透力与持久艺术魅力的传播生命力。他于去世前一个月所写的、发表于1936年9月20日《中流》半月刊第1卷第2期的《死》便是这种情形的最后绝唱:

七,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

此外自然还有,现在忘记了。只还记得在发热时,又曾想到欧洲人临死时,往往有一种仪式,是请别人宽恕,自己也宽恕了别人。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来,怎么回答呢?我想了一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sup>[11]</sup>

这是鲁迅以遗嘱方式所写的“独语”,也同时凸显出他“怨敌可谓多矣”的“公仇”式的生存。“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确乎是他“独语”一生又“公仇”一生的凝聚与写照,凸显出20世纪中国现代传媒最为广远的传播生命力所在。在高度娱乐化的今天,中国现代传媒能否摆脱媚俗与纵欲,以及思想贫弱化的文化眩惑,继续担负起“人的现代化”这一未竟的历史与文化使命,释放出对人性之守望的职能,鲁迅“独语”与“公仇”的独特存在依然向其发出具有历史穿透力的召示。

## 参考文献:

- [1] 鲁迅. 鲁迅全集(第1卷)[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445.
- [2] 鲁迅. 鲁迅全集(第4卷)[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468.
- [3] 孙玉石.《野草》研究[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6.
- [4] 曹聚仁. 文坛五十年[M]. 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7:8.
- [5] 凌宇. 从边城走向世界[M]. 长沙:岳麓书社,2006:398.
- [6] 刘江凯. 独语的,世界的——鲁迅《野草》英语接受的启示[J]. 文艺争鸣,2012(6).
- [7] 解洪祥. 中国现代文学精神[M]. 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84.
- [8] 李长之. 鲁迅批判[M]. 北京:北京出版社,2003:143.
- [9] 田中阳. 双轮:本土与现代[M]. 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07:63.
- [10] 鲁迅. 鲁迅全集(第13卷)[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113.
- [11] 鲁迅. 鲁迅全集(第6卷)[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635.